

◎名人书房

# 韩茂莉：用阅读丈量山海纵横

董世捷 张鹏禹

历史地理学是什么？这个在大众眼中相对冷门的学科，却是韩茂莉毕生钻研的领域。她是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在历史地理学领域耕耘近40年；从1993年《宋代农业地理》问世到2012年中国第一部通代农业地理专著《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出版，她不仅创立了历史农业地理的撰写体例，并且解决了该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她的课堂座无虚席，所授课程两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无论作为学者还是教师，韩茂莉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近日，我们来到韩茂莉位于北京大学的办公室，聊她读书求学的经历、治学研究的体会，听她讲述如何以独到的历史地理学视角解读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故事，如何以阅读的厚度丈量山海的纵横。

## 家庭教育埋下读书种子

“我小时候在姥爷家长大，他不是学者，但对读书、教育的重视超过当时的大多数家庭。”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韩茂莉谈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姥爷。记忆中，姥爷的家在北京东城一个规整的四合院，有一整间房四壁都是书架。因在协和医院工作，姥爷书房里的书不只有各种中文古籍，还有大量外文书。“当时我年纪小，对这些书没多少兴趣，但这满墙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韩茂莉说。

韩茂莉的父母从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毕业后，就作为农业科技人员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11岁时，她来到父母身边。韩茂莉回忆，当时父母的宿舍非常狭小，没有专门放书的地方，但家里依旧堆满了各类与农业相关的书，这为她日后从事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埋下了种子。“像《土壤学》《耕作学》《作物学》，上面有米丘林等人名和专业名词，我是非常熟悉的。那时我也开始逐渐积累属于自己的书。”

在那个图书资源匮乏的年代，韩茂莉向同学借阅“四大名著”“三言二拍”和唐宋传奇等古代小说，还和家人一起手抄了《古文观止》中的诸多篇章。不仅如此，她还搜集了很多数理化教材提前自

学，在小学时就自学中学代数。韩茂莉说：“在家人影响下，我那时已将读书、自学变成一种习惯。”而母亲口中年轻时在贝满女中求学的经历，更让韩茂莉认识到，读书学习的美好不仅在于获取知识、拥有智慧，更能借此结识一批良师益友，对人生产生深远影响。

1977年恢复高考后，韩茂莉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系，又在本科毕业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博士。韩茂莉说，历史地理是介于理科和文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需要读的书非常多，除了传统历史学必读的古籍文献，还要阅读相邻学科的书，比如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等。“当时我住集体宿舍，床下放的是书箱，褥子底下铺的是书，床的边角也放着一排排书。”韩茂莉开玩笑说，“我的床不光住人，更住着书”。

## 做学问贵在持之以恒

韩茂莉本科选择学地理只是一个偶然，“当时为了能顺利录取，没敢选热门专业”。但学着学着，她忽然发现这个专业很适合自己，也暗自设想如果有一个专业能将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那该多好。后来，韩茂莉读到了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和侯仁之先生的《步芳集》，惊喜地发现真的有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从此我就梦想成为历史地理专业中的一员，一步不停地努力，从不敢耽误时间。”她说。

做研究往往是枯燥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尤其如此，要阅读大量的方志、调查报告，里面有很多数据表格。“很多学生听完我的课后说，‘这个专业太有意思了，我以后要学’。我都劝他们要想好。”韩茂莉说，“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报告中去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建立逻辑关系，真是枯燥得不得了，很多同行干着干着就放弃了”。

但这样的研究工作，她一干就是近40年。在电脑尚未盛行的年代，她在一张张文摘卡上手抄和自身研究相关的文献段落，通过将文摘卡比较、分类、建立逻辑联系来寻找研究思路，前前后后抄录的文



韩茂莉在家中。

受访者供图

摘卡达3万多张。为了在家中尽可能多地放置书籍文献，她和丈夫辛德勇将40多个书架呈W型一排排放在客厅、卧室、阳台甚至卫生间也推着书。不光家里下不去脚，连我们采访的办公室也像一个小图书馆，三面摆得满满的书架环绕着一套桌椅，书架的每一层都有两排甚至三排书。持之以恒，甘之如饴，学术生涯里那些青灯独明的夜晚有多少，韩茂莉已经数不清。她只知道，读书已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柜子的那一大摞考古报告，没有一个字是不枯燥的。但是一旦读进去了，做出了新的研究成果，就会获得一种比做任何事情都享受的乐趣。”韩茂莉说。

## 具备地理学的眼光

在韩茂莉眼中，学术终究是为大众服务的。她不仅注重钻研教学方法，用深入浅出、灵活生动的讲法，让学生爱上历史地理学，还写作了《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等通识教材。她写给大家看的历史地理学普及读物《大地中国》问世后就入选多个书榜，受到读者欢迎。里面的一些话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我们今天吃的谷子、水稻竟是中国古代先民驯化的结果，之后这些人工培育的农作物沿着不同线路传播到四面八方；“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与江南涌现出的诸多杰出人才也有密切关系。

在历史地理领域耕耘数十载，很多看似寻常的现象和人尽皆知的常识，在韩茂莉眼中都藏着新问题，可能有新发现。《大地中国》有一个章节解读了一种在中国乡村由来已久的现象——赶集。韩茂莉提出，“赶集”蕴藏着一个地理问题，即赶特定市集的农民是固定的，他们有时会赶单日集，有时会赶双日集，要看有没有

农产品。如此一来，互补出现的市集勾勒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客源区，这就是所谓的“十里八村”。而后，韩茂莉又证明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最远的认知空间也正是赶集的客源区范围。

能在寻常中发现新意，提炼出新观点、新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这需要一种地理学眼光。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赴黄土高原进行综合考察时，韩茂莉就开始关注赶集这一现象。经过长期的阅读和思考，这层“窗户纸”才终于被捅破。

“你知道山东和山西为什么隔得这么远吗？他们的分界是哪座山？”韩茂莉问我们。“这可真没想过。”我们答。她娓娓道来：今天的山东、山西，并非古代的山东、山西。大约在商周时期，古人口中的山东山西，以崤山为界（在今河南省灵宝市）。与崤山相对的就是著名的函谷关，以函谷关和崤山为界，就构成了时人心目中的关东、关西、山东、山西。西汉中期，汉武帝将关中传统空间向四方扩展，函谷关与太行山构成的共同界线，成为关东、关西和山东、山西之界。南宋时，金王朝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设置了山东东路、山东西路两个行政区，其范围与今天的山东省非常接近，这就和原来以太行山为界的“山东”完全不搭界了。从金代延续到明清，“山西”还在山西，而山东和山西之间隔出了一个河北。“这是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明清，一系列历史地理演变的结果。”韩茂莉说。

采访最后，韩茂莉推荐了《地理学与生活》一书，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阅读发现地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收获乐趣。这本书是世界地理学界的经典之作，其中涉及对人体有害的天气现象、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城市形态的变化、城市垃圾与危险废物的处理等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不能不加区别地将《孙子兵法》中的“诡诈之道”运用到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中去，否则就会只剩下凉薄的功利之心，造成严重的信用危机。

在黄朴民看来，《孙子兵法》的思想博大精深，绝非只讲诡道。事实上，孙子极为注重发展自身实力，强调“五事七计”（《计篇》），从政治、天时、地利、将材、制度等五方面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强调“修道而保法”（《形篇》），修明政治，健全法制。尤其是孙子在《虚实篇》提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即着重发展自身实力，尊重战争一般规律的同时，又要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地采取对策，如此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正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与灵魂。



## 原汁原味解读《孙子兵法》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第一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武经冠冕”“百世谈兵之祖”，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与诸子百家中的众多经典一样，直到今天依旧闪耀着思想的光芒。然而长期以来，大众对《孙子兵法》存在一些误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积30多年研究经验推出的《孙子兵法译注》《孙子兵法十八讲》（浙江文艺出版社），对这部经典著作进行了原汁原味的解读。在黄朴民看来，

为避免偏离经典的基本宗旨，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真正为我们今天的工作与生活提供有益启迪，应该秉持科学理性的精神，遵循正确合理的原则与方法阅读《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译注》对《孙子兵法》的诸多疑难点作出了详尽注释，有典可据；全文翻译，与原文呈双栏排列，令人一目了然。此外，每一篇还有作者的题解和札记，题解提纲挈领，概述每篇主要意旨，兼负导读之责；札记阐述作者独到心得，

并针对篇目中的一些疑难点、争议处条分缕析。《孙子兵法十八讲》从梳理中国古代兵家脉络开篇，诠释《孙子兵法》的核心理念，对《孙子兵法》的方方面面进行解读。

书中的一些观点，颇富启发性。比如对于有人将《孙子兵法》的兵学原理和商业经营、企业管理等经济活动加以联系的做法，作者认为，不能将《孙子兵法》中的“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计篇》）的思想，简单比附为“商以诈立”，认为商业竞争也要讲求诡诈之道。《孙子兵法》讲的是用兵之法，它的本质是对敌人而不是对自己人；商业竞争与企业经营管理是非对抗性矛盾，要讲求诚信、合作共赢。因此，战争和商业竞争是

## 自传《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出版

### 做好“观众的考生”

本报记者 徐嘉伟

“我是观众的考生”，濮存昕在自传结语中写道。年近古稀的他，演了一生，如今转换角色，以自传作者的身份谈角色、说表演、叹人生，用一颗真心将几十年艺术人生的所思所感捧至读者面前，接受大家的检验。

不久前，自传《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作者曾经饰演过的角色为主线，分享了多年来在演艺道路上的历练、探索、创新和思考。

角色串联人生。从知青时期在业余宣传队排演独幕话剧《苹果树下》，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话剧团收获人生第一个男主角——《周郎拜寿》的A组周郎；从转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饰演《秦皇父子》中公子扶苏一角，到《雷雨》里完成从儿子演到父亲再执导的“三级跳”；从参演电影《鲁迅》和《一轮明月》，塑造鲁迅和弘一法师两个“很得意”的角色，到形成一套自己的演出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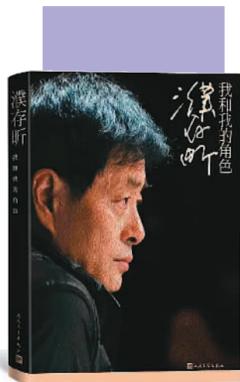
濮存昕在书中回顾了演艺生涯中的重要节点，也让读者得以在一回回的故事讲述中，看到他对于每一个角色的付出和思考。

人生丰满角色。濮存昕在自传第一章讲述了清白家风对自己的熏陶，又在随后两章将青春时期的稚气、鲁莽与欲望写得坦率。而这一切的人生阅历都为曾经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演员做了铺垫。再后来，濮存昕得遇机会，出演众多重要角色，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仍不忘“戏比天大”的“人艺精神”，因为他知道“演员是一份讲诚实的工作，不老实、缺诚实是演不出角色的真实感的”。这种对演员和角色关系的深入阐释，不仅

让读者了解演员的内心世界和职业追求，更从中凸显出作者对戏剧艺术的敬畏和热爱。

“在舞台上创造奇观和美景固然重要，但演员在表演中释放的生命能量才是观众买票进剧场的最大理由。”濮存昕的文字透着平实，一路走来，得失都只娓娓道来，不掩饰、不渲染，做到了他对自己的要求——“尽量不编，不矫情，一切都要立足于真实”。

如今，从艺40多年的濮存昕也像前辈们一样即将迎来“谢幕”的时刻，他期望能再演三五年好角色，给观众带去人物之真、话剧之美、艺术之思。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山乡巨变，吸引着创作者的目光。2022年8月，中国作协在作家周立波的家乡湖南益阳清溪村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面向文学界和广大创作者征集作品。近一年来，该计划共收到作品1000余部。作为首批重点推进作品，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王松的《热雪》、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已正式出版。

为发现和培育更多基层文学新生力量，推出更多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温度的优秀作品，联合各级作协组织、文学名刊名社和广大创作者共同推动计划不断走深走实，7月18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在山东临沂召开。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在推进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宣传发动，着力扩大“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社会参与度。各级作协组织要引领作家下沉基层、融入山乡，创作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优秀作品。文学期刊和出版社要有效延伸创作计划触角，推荐真正有思想、有品位、高质量的作品。要不间断挖掘真正了解乡村、具有创作潜力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基层作家等新生力量，敞开胸怀接纳“陌生人”，勇于推出文学“新面孔”。

推进会上公布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第二批重点推进作品11部，分别是周瑛璞的《芬芳》、刘庆邦的《泪为谁流》、柳岸的《天下良田》、翟妍的《长河荡》、李铭的《春暖燕归来》、何常在的《向上》、麦苏的《陶三圆的春夏秋冬》、界愚的《纯真年代》、滕非的《大河宛然》、郑欲翔的《人往低处走》、朱朝敏的《水未央》；确定了“名刊名社拓展计划”重点推进作品9部，分别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荐的宋丹丹的《太阳地》、《钟山》杂志社推荐的王清平的《流转》和王宗坤的《极顶》、花城出版社推荐的赢春衣的《翠山情》、《民族文学》杂志社推荐的陈茂智的《红薯大地》、湖南文艺出版社推荐的欧阳艳飞和周亦乔的《南山谣》以及舒文治的《立传笔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荐的李伯勇的《别人的太阳》。

7月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作家活动周”在山东临沂启动。在为期3天时间里，作家们在临沂和曲阜多地，围绕“红色沂蒙”“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等主题开展实地考察调研，寻访孔子故里，聆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专题讲座，在人民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感受山乡巨变，领略文化魅力。

## 讲述故宫文物南迁故事

王诗霖



1933年，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掠，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一万多箱故宫文物南迁，时延数十年，地逾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艰辛。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淹没于历史中。”身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怀着这样肃穆的心情，写下长篇纪实文学《故宫文物南迁》，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从《故宫的古物之美》专注于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抒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试图以当代视角完成一个文化学者对古老文明的独特解码与重述。

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作家以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原貌，以翔实的考证重现南迁历程。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裔；随同故宫博物院专家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